

魏源《诗比兴笺》“诗文互渗”选、评特征论析

钱 昊

(江苏大学文学院, 江苏省镇江市, 212013; qianhao9110@163.com)

摘 要: 清人魏源(1794-1857)编纂的诗歌选本《诗比兴笺》在选诗、评诗上有着鲜明的“诗文互渗”特征。是部选本选入了一篇非诗作品——陶渊明的《闲情赋》, 魏源因《闲情赋》长于比兴且並祖《诗》《骚》而将其选入。《诗比兴笺》亦与魏源编纂的另一部文学选本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在经世思想上形成会通。如魏源选钞阮籍、陶渊明两位隐遁诗人诗作时不突出他们的消极避世情绪, 而有意揭橥二人发愤为诗的一面; 选钞唐代大小李(李白、李商隐)诗作时, 亦大力标举他们的用世情怀。魏源于清晚期变局中为学、为官皆重“经世致用”, 并通过“诗文互渗”将经世抱负落实到《诗比兴笺》当中, 呈现给欲讽诵传习的读者。

关键词: 魏源; 《诗比兴笺》; 诗文互渗; 经世致用

引言

《诗比兴笺》系清人魏源(1794-1857)编纂的一部诗歌选本, 是部选本选入汉魏六朝诗歌十八家(类), 以及唐代诗歌十二家。选本附有魏源本人的笺注。《诗比兴笺》虽以选诗为要, 然魏源选、评诗歌时十分注重诗与文的相互参照, 这一点, 学界此前已有相关论述, 如马玉《〈诗比兴笺〉考论》一文指出《诗比兴笺》笺注有“以文证诗”的特点, 如魏源多用书、奏、表、赋等笺注诗歌, 马玉论文还以枚乘、刘琨、庾信、陈子昂等人的诗作为例做了具体的阐述[1]。柯柏琴《〈诗比兴笺〉研究三题》一文亦对“以文释诗”有所观照, 指出《诗比兴笺》“以文释诗”包括两个方面, 即“以入选诗人所作之文释诗”和“以他人之文释诗”[2]。笔者认为, 除了魏源笺文中的“以文证诗”外, 《诗比兴笺》“诗文互渗”的特征尚有不少可挖掘之处, 特别是以这种方法呈现文学思想的一面, 此前学界对此一方面的探讨并不丰富。本文试就《诗比兴笺》的“诗文互渗”选、评特征予以申论。

1. 独特的一篇: 陶渊明《闲情赋》的选入

《诗比兴笺》选入陶渊明诗作三十五首, 在三十五首诗后, 魏源以附录形式选钞了《闲情赋》。《诗比兴笺》中其他诗人、诗类均无“附录”, 且《闲情赋》为四六相杂的骈赋, 系《诗比兴笺》中唯一一篇严格意义上不属于诗体的作品, 将陶渊明此作置入以“诗”为题的选本之中, 颇显另类。然而, 魏源选钞《闲情赋》得用意很深, 他在笺文中指出:

《闲情赋》, 渊明之拟《骚》。从来拟《骚》之作, 见于《楚辞集注》者, 无非灵均之重台。独渊明此赋, 比兴虽同, 而无一语之似, 真得拟古之神。东坡云: “晋无文, 惟渊明《归去来辞》一篇而已。”予亦曰: “晋无文, 惟渊明《闲情》一赋而已。”[3]

魏源认为《闲情赋》是晋代文章中最杰出的一篇, 而同时期其余文学家的文章皆不可观。这一评价颇高, 且在同代学人评点《闲情赋》的言论中显得特出。较魏源稍早的桐城派旗手方东树(1772-1851)在其名著《昭昧詹言》中便对《闲情赋》大张挞伐: “如渊明《闲情赋》, 可以不作。后世循之, 直是轻薄淫褻, 最误子弟。”[4]方东树以陶渊明《闲情赋》为“轻薄淫褻”的不良示范, 系误人子弟之作。魏源则大力标举《闲情赋》, 与方东树大异其趣。笔者认为, 魏源选钞《闲情赋》意在标榜《闲情赋》对“比兴”手法的运用娴熟而不落窠臼, 追步、模拟《离骚》而不泥于《离骚》。这种通过巧妙的创作手法继承前代佳作神韵的做法, 不仅适用于文章的创作, 对诗歌一体而言亦是如此。《诗比兴笺》以“比兴”为名, 重在以“比兴”说诗, 将一篇长于比兴的作品置入其中, 恰是为所选历代诗歌设立了可供参考与对比的标杆, 使读者在体悟《闲情赋》纯熟比兴手法的基础上对历代诗歌加以鉴赏。

从魏源的笺文来看,《闲情赋》不仅承袭了《楚辞》,还有着承袭《诗经》之处,魏源是借对《文选》的批评道出这一点的:

乃昭明谓为白璧之瑕,不但与所选宋玉诸赋,自相刺谬,且以闲情为好色。则《离骚》美人香草,湘灵二姚,鸩鸟为媒,亦将斥为绮词乎?《国风·关雎》亦当删汰乎?固哉,昭明之为诗!宜东坡一生不喜《文选》也[3]。

在此段论述中,魏源除了言及《闲情赋》在具体比兴手法上与《离骚》的相似性,也指出《闲情赋》与《国风·关雎》异曲同工,认为《闲情赋》同时具有中国古典诗歌两大源头的长处。魏源另外借助苏轼(1037-1101)的文学观念批评了昭明太子萧统(501-531)。苏轼曾指出《闲情赋》“正使不及《周南》,与屈、宋所陈何异?而统乃讥之,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。”[5]苏轼认为萧统的文学观念有幼稚之处。魏源则通过其笺文对苏轼的诗学观念表达了赞许之意,十分看重一篇作品“並祖《诗》、《骚》”的特点。翻检魏源的其他著述,亦可发现他始终注重“诗文互渗”的阐发。他曾在代陶澍(1779-1839)撰写的《国朝古文类钞叙》一文中主张文学选本的编纂要以《诗经》《尚书》为标杆[6]。在魏源看来,不能秉承经学典籍要义的文学选本则难言佳作。魏源把文学选编与《诗经》相联系,是为魏源“诗文互渗”观念的又一例证。

魏源对《诗经》《楚辞》这两大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甚为推崇。《诗比兴笺》笺文则着重论述所选诗歌取法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一面,仅以所选汉魏六朝诗歌为例,魏源便大量征引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内容作为笺文。据笔者统计,《诗比兴笺》汉魏六朝部分有二十一首诗及两处总论征引了《诗经》及《楚辞》的内容作为笺文。魏源征引《诗经》,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俱全,征引《楚辞》则《离骚》《九章》《九歌》《远游》乃至宋玉《高唐赋》兼备,多元并存,不一而足。魏源在笺注中特别指出一部分诗作是並祖《诗》《骚》的,如枚乘诗作,魏源便指出其有“上续风骚,下启百世”[3]这一在诗史上继往开来的功绩。又如阮籍《咏怀诗》(“丹心失恩泽”),魏源笺曰:“宜《小弁》之哀怨、三闾之流涕也。”[3]《小弁》系《小雅》中的一篇,抒发主人公见弃于父母,无奈流浪的哀怨愤懑,与三闾大夫屈原《离骚》放逐赋诗的情感相类,《诗》《骚》并见,可知魏源选诗与注诗的偏好。魏源对《咏怀诗》(“丹心失恩泽”)的笺注还具有揭示“典中之典”的功用,此诗中“高子怨新诗”一句实为化用《孟子·告子下》中公孙丑与孟子的对话。魏源在笺文中言及《诗经·小弁》,暗含阮籍用《孟子》之典的故实。据此可以见出魏源十分看重儒家重要学者对《诗经》的认知,以及相关认知对后代文学家从事诗歌创作的影响。

回到魏源对陶渊明《闲情赋》选钞,在他看来,《闲情赋》是一篇並祖《诗》《骚》的佳作,对“比兴”手法的运用甚为纯熟,其示范意义远远超过了赋这一文体,对诗歌一体亦有借鉴意义。魏源选钞这一篇赋作可以和《诗比兴笺》中那些取法《诗经》与《楚辞》的诗作互为表里,揭示诗歌创作若需趋近较高境界,当有何种面貌。读者通过阅读《诗比兴笺》,亦可知晓魏源心目中汉魏六朝文学作品的标杆为何,以“长于比兴”的《闲情赋》作为参考系以品读魏源所选汉魏六朝诗歌。

2. “经世抱负”:《诗比兴笺》与《皇朝经世文编》文学思想的会通

魏源十分重视集部之学,他热心于编纂诗歌选本,亦积极投入文章选本的编纂,体量达一百二十卷之多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便是魏源编选文章的扛鼎之作。而《诗比兴笺》与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在文学思想上多有照应,这是魏源着重“诗文互渗”选、评方法的又一大体现。《皇朝经世文编》署为善化贺长龄辑、邵阳魏源编次,然实为魏源本人倾力完成。贺长龄(1875-1848),字耦耕,号耐庵,湖南善化(今湖南长沙)人,清中晚期名臣,累迁南昌知府、广西按察使、江苏按察使、江苏布政使、山东巡抚、江宁布政使、福建布政使、贵州巡抚、云贵总督等职,有《耐庵诗文集》《孝经集注》等著作传世。魏源于道光五年(1825)入贺长龄幕,其时贺长龄为江苏布政使[7]。贺长龄是《皇朝经世文编》的倡议者,有选题策划之功,但编辑工作实为其幕友魏源承担。因此,我们将《皇朝经世文编》视为魏源文学思想的载体是合适的。

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广泛选取清代前中期“经世致用”之文二千二百三十六篇。魏源运用分类选钞的形式,将所选文章分为学术、治体等八大类,其中“学术”一类又细分为六小类。最能体现魏源文学思想的就是“学术”中“文学”一类,“文学”类选文三十一篇,其中有不少篇目所阐发的观念都能在《诗比兴笺》当中见出呼应,如《皇朝经世文编》选钞的王鸣盛(1722-1798)《论泥古之弊》一文便指出:

然则古可好也,不可拟也,声音固尔,文字亦然。盖声音、文字随时而变化,此势所以必至,圣人亦不能背时而复古[8]。

据此可见王鸣盛认为后世之人可以爱好古人的作品,却不可为拟古之作。他指出随着声音、文字等要素在不同时代的变化,拟古在技术上已不可行。而魏源在《诗比兴笺》中也抒发了对拟古的看法,如在选钞庾信(513-581)《咏怀》时,魏源指出:

《艺文类聚》但称庾信《咏怀诗》,不云拟也。《诗纪》强增为《拟咏怀》,亦如增文通诗为“效阮”,岂知自家块垒,无俟他人酒杯乎?[3]

魏源辨析了前代类书与总集对庾信《咏怀》的著录，他认可唐人欧阳询（557-641）所编《艺文类聚》所称引的诗题，其中并无“拟”字。而魏源对明人冯惟讷（1512-1572）所编《诗纪》以庾信此作题为“《拟咏怀》”表达了不满。在魏源看来，庾信此作能自出机杼，抒写诗人自家心中块垒，冯惟讷于诗题中增一“拟”字，实为未能把握庾信创作之实质所致。魏源没有如王鸣盛一般从声音、文字这些技术层面来探讨拟古，而是从诗人的情志这一内在根源说明拟古的不可取，然而，他对拟古之弊的指摘与王鸣盛其实是一致的。当然，《诗比兴笺》也选入了一些以“拟古”为题的诗，如陶渊明《拟古》九首，选入这些诗作看似与反对拟古的文学主张矛盾，然而，魏源多能从陶诗不同于前代诗作的角度予以评点，指出这些诗作呈现了“陶诗本怀”[3]。

《诗比兴笺》与《皇朝经世文编》的会通还体现在“诗言志”之说的互见上。《皇朝经世文编》所选顾炎武（1613-1682）《日知录·论文》一文指出：“诗言志，此诗之本也。”[8]而魏源编纂《诗比兴笺》也着意沿袭“诗言志”的传统：

自《昭明文选》专取藻翰，李善《选注》专诂名象，不问诗人所言何志，而诗教一蔽；自钟嵘、司空图、严沧浪有《诗品》《诗话》之学，专揣于音节风调，不问诗人所言何志，而诗教再蔽。而欲其兴会萧瑟嵯峨，有古诗之意，其可得哉！[3]

魏源认为上述著作实引发了不良风气，它们或重文学作品之辞藻，或多训诂物象，或围绕艺术特征方面的特征发论，却没有触及诗歌创作的本原——“诗言志”，也少有诗教观的融入。他基于对相关著作的指摘，明确阐发编纂《诗比兴笺》的宗旨：

笺汉、魏、唐之诗，使读者知比兴之所起，即知志之所之也[3]。

据此可见魏源编纂《诗比兴笺》着意呈现诗歌“比兴”手法，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诗歌的“言志”功能，以此引导读者，这与他在《皇朝经世文编》中选钞顾炎武之文所要传递的诗学观念是一致的。

魏源在清晚期变局中编成《诗比兴笺》，而《诗比兴笺》对《皇朝经世文编》贯穿始终的“经世”观念也有着明显的呼应。魏源很早就展露他的“经世”之才，他加入贺长龄幕府的道光五年，与贺长龄、魏源同为湘人的陶澍（1779-1839）调任江苏巡抚，陶氏到任后，“凡海运水利诸大政，咸与（魏源）筹议”[7]，可见魏源“经世”之才受到了地方大员的青睐。正是在道光五年，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开始编纂，次年仲冬完成。魏源在编纂《皇朝经世文编》时原拟汇编《会典提纲》《皇舆图表》《职官因革》及《明代经世》等著作，然最终均未脱稿[8]。尽管如此，今人仍能从这些著作的题名中见出魏源“经世”思想的伸展。《皇朝经世文编》例言指出：“书各有旨归，道存乎实用。志在措正施行，何取纤途广径。”[8]可见，《皇朝经世文编》无广收滥取之弊，全书以“经世”为旨归，强调文章的现实功用。《皇朝经世文编》问世之后影响颇大，续作次第而出，如盛康（1814-1902）《皇朝经世文续编》、葛士濬（1848-1895）《皇朝经世文续编》、麦仲华（1876-1956）《皇朝经世文新编》等，无不是以魏源之作为标杆，加以续编。清末硕儒俞樾（1821-1907）在为葛士濬《皇朝经世文续编》作序时称：“《皇朝经世文编》数十年来风行海内，凡讲求经济者，无不奉此书为架筏。”[9]观俞樾言下之意，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实引领了一代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。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全书以“经世”为旨归，而《诗比兴笺》则不是专门讨论“经世”之学的著作，但“经世”观念在《诗比兴笺》中往往可见，以下试予析论。

2.1. 标举魏晋隐遁诗人“发愤为诗”的一面

《诗比兴笺》于汉魏六朝这一历史时期选诗数量最多的诗人是阮籍（三十八首）和陶渊明（三十五首），二人诗歌约占《诗比兴笺》所选汉魏六朝诗总数的45%，足见魏源青睐之意。在以往的诗学认知中，阮籍、陶渊明二人是以隐遁诗人的姿态出现在诗史中的，历来揭示阮、陶二人隐逸旨趣的者不在少数。魏源则不落窠臼，独出机杼，他在标举阮、陶二人时并不突出他们的消极避世，而是将他们视为仁人志士，重点呈现他们发愤为诗的一面。

2.1.1. 对阮籍的标举

阮籍于曹魏正始年间文坛特出，又多以隐遁诗人形象为后世所认知。魏源在选钞阮籍咏怀诗的序言中征引颜延之（384-456）的观点并加以评述：

颜延年注《咏怀诗》曰：“阮公身事乱朝，常恐遇祸。因兹发咏，故每有忧生之嗟，虽事在刺讽，而文多隐避。百世而下，难以情测也。”今案阮公凭临广武，啸傲苏门；远迹曹爽，洁身懿、师。其诗歌愤怀禅代，凭吊今古。盖仁人志士发愤焉，岂直忧生之嗟而已哉！特寄托至深，立言有体，比兴多于赋颂，奥诂达其渺思[3]。

此论系魏源对颜延之诗论的纠正，他指出阮籍诗歌并不像颜延年所说的那样“难以情测”，而是渗透着“愤怀禅代”的情绪，“禅代”即曹氏“禅”、司马氏“代”一事，直指曹魏时政，揭示了阮籍对司马氏当权的不满。而且魏源明言阮籍诗歌是“仁人志士发愤焉”，诗中不只有那些忧虑人生的嗟叹。不过，魏源也解释了为什么颜延之会认为阮籍诗歌“文多隐避”，盖因阮籍诗歌中“比兴多于赋颂”，常用比较深奥曲折

的表达方式来抒发悠远之思，故不易使人解读。可以见出，魏源在评述颜延之观点时也带出了对阮籍诗歌艺术手法的称赞。不惟序言，魏源在笺文中也都能托出阮籍作为仁人志士发愤为诗的形象。如《咏怀诗》（“嘉树下成蹊”）一首，魏源笺曰：

司马懿尽录魏王公置于邺。嘉树凋落，繁华憔悴，皆宗枝翦除之喻也。不然，去何必于西山，身何至于不保 [3]？

在魏源看来，阮籍原无消极心态，本不愿去往西山做一位隐士，惟司马氏把持朝政的时局令其愤懑而已。又如在选钞阮籍《咏怀诗》中的“步出上东门”、“开秋兆凉气”、“世务何缤纷”、“炎观延万里”、“夸谈快愤懑”、“悬车在西南”、“混元生两仪”、“少年学击刺”、“生辰命安在”、“步游三衢旁”等十首后，魏源作笺文予以综论：

或《采薇》长往，矫首阳之思；或拔剑捐躯，奋《国殇》之志；或揽羲辔于云汉，手无斧柯；或盼同志于天涯，目穷蒙汜。但能比类属词，何殊百虑一致 [3]。

上述十首《咏怀诗》在魏源看来主题不一，有的确实表达了隐居之意，即所谓“或《采薇》长往，矫首阳之思”，以用伯夷叔齐之典揭示自家情志。但这些诗作中亦有报国志向之抒发，即所谓“或拔剑捐躯，奋《国殇》之志”，慷慨勃发，情志豪壮，魏源的阐释无疑突破了阮籍仅限于隐遁诗人的形象。

有趣的是，魏源尔后在选钞陈子昂（661-702）诗作时仍对阮籍的入世心态念念不忘，他以对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的评价再次言及阮籍发愤为诗的一面：“岂知子昂幽州之歌，即阮公广武之叹哉！” [3]魏源认为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的情志与“阮籍广武之叹”一脉相承，表达了对英雄济世的期待。而魏源此处对陈子昂的评价也呼应了《诗比兴笺》总论阮籍《咏怀诗》时提及的“今案阮公凭临广武，啸傲苏门；远迹曹爽，洁身懿、师”一句，既是对陈子昂渴望用世的褒扬，又是对阮籍的发愤为诗的再次肯定。

2.1.2. 对陶渊明的标举

陶渊明被钟嵘（约468-约518）称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 [10]，这一对陶渊明的定位影响至深，陶渊明的隐者形象影响了历代读陶者。然而，魏源指出读陶者往往存在这样的弊端：

惟知《归园》《移居》及田间诗十数首，景物堪玩，意趣易明。至若《饮酒》《贫士》，便已罕寻。《拟古》《杂诗》，意更难测，徒以陶公为田舍之翁、闲适之祖，此一蔽也 [3]。

不难见出，魏源认为陶渊明的诗歌主题是多元的，在田园诗之外，陶渊明还有许多作品值得后人涵玩。魏源反对将陶渊明脸谱化，反对只将其视为一个“闲适田翁”式的诗人。

其实，前文言及的《闲情赋》的入选，便是魏源力避将陶渊明脸谱化的一大做法。鲁迅（1881-1936）曾以《闲情赋》为例，说明陶渊明还有“摩登”的一面：

又如被选家录取了《归去来辞》和《桃花源记》，被论客赞赏着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先生，在后人的心目中，实在飘逸得太久了，但在全集里，他却有时很摩登，“愿在丝而为履，附素足以周旋，悲行止之有节，空委弃于床前”，竟想摇身一变，化为“阿呀呀，我的爱人呀”的鞋子，虽然来自说因为“止于礼义”，未能进攻到底，但那胡思乱想的自白，究竟是大胆的 [11]。

鲁迅认为，《闲情赋》是吟咏爱情的作品，虽然“止于礼义”，但亦十分大胆。在《闲情赋》中所见出的陶渊明就与人们熟知的隐者大为不同，鲁迅此论对“飘逸得太久了”的陶渊明予以新的阐释，可见其作品与形象之多元。降及当代，袁行霈以“止乎礼义”与否对“爱情赋”和“闲情赋”做了细分：

爱情赋虽然多数以不得交接结束，但双方毕竟发生了爱情，爱情不是自己压抑下去的。闲情则不然，有爱的发生甚至发展到了不可扼止的地步，但还是压抑下去了 [12]。

袁行霈论文又以陶渊明《闲情赋》为“闲情赋”这种赋类的顶点 [12]。陶渊明《闲情赋》着意踵武张衡、蔡邕二人的同类赋作，与“采菊东篱下”这类的闲适田园诗大异其趣。袁行霈据此发论：“由此可以看到渊明并不枯槁的一面。” [12]诚哉斯言。由此可知，魏源在《诗比兴笺》中选入《闲情赋》这独特的一篇，既是标举此赋长于比兴的需要，也是呈现陶渊明多元形象，避免脸谱化的做法。

回到魏源对陶渊明发愤为诗的标举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在《诗比兴笺》中，陶渊明诗歌的选目颇见魏源志趣，魏源并未选钞《归园田居》《饮酒》等陶渊明抒写田园意趣之诗，而多选其慷慨发愤的意气之作，如《读山海经》《咏荆轲》《拟古》等诗作，这显然是魏源力避将陶渊明脸谱化使然。魏源亦在笺文中大力称赞陶渊明拳拳报国之心：

渊明初辞义熙之辞，亦谓时未可以仕耳。岂图大命遽倾，终古永诀别哉……故知不以离隔而忘久要者，许身之友也；不以恤纬而忘宗国者，致命之士也 [3]。

此论将陶渊明视为“许身之友”、“致命之士”，指出陶渊明面对国家时局深表忧虑，毫不涉及隐逸之趣，这实际上与将视阮籍为“仁人志士”如出一辙。据此可以见出，《诗比兴笺》所呈现的陶渊明形象与承袭自钟嵘《诗品》的传统认知有着很大的不同。

2.2. 对唐代大、小李用世情怀的标举

《诗比兴笺》所选唐人诗歌计二百七十二首，其中选诗较多的为陈子昂（四十三首）、李白（五十七首）、杜甫（四十三首）、韩愈（五十三首）。陈子昂、杜甫、韩愈等人积极用世的一面早为文学史家所熟知，而魏源所选三人之诗亦多能体现经世致用之志，笔者于此不再赘述。比较值得探讨的是李白及李商隐的诗作，李白以其“飘逸不群”人格与诗风名世，李商隐则以“凄艳浑融”的诗风为世人熟知。而魏源对大、小李诗作的选钞与评点颇具特色，不落前人窠臼，以下试分而论之。

先言李白，李白有其用世的一面，《新唐书》便载李白“然喜纵横术”[13]。可见李白乐于驰骋先秦纵横家般的辩才，希望以此见用于当世，辅佐君主成就帝业，亦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但由于李白仕途遭忧后一步步地走向求仙、求道，形成了一种逍遥不羁的个性与气质，其积极用世的一面便为多为其仙风道骨的形象所掩盖。魏源对李白“遗世独立”的特质有所体认，如魏源于李白五十九首《古风》中遴选二十八首置入《诗比兴笺》之中，魏源在笺文中交代了他选钞这二十八首的原因：“皆遁世避乱之词，托之游仙也。《古风》五十九章，涉仙者居半。”[3]魏源将《古风》中近半数的游仙之作钞入《诗比兴笺》中，突出了李白飘逸不群，颇近世外仙人的一面。但魏源所选李白诗歌却并不局限于此，他还选钞了李白的乐府诗，魏源指出：“太白诗不离仙、酒、佳人三事，惟《乐府》不涉此习，故知其用志所在。”[3]魏源特意表明李白乐府与“仙”、“酒”、“佳人”无涉，而是“用志之诗”。

魏源在对具体的诗作进行点评时，也着重指出李白乐府与《古风》中那些求仙之作大异其趣，如《春日行》一诗的笺文：

此以王道讽求仙也。不直讥求仙，而曰“帝不去，留镐京。安能为轩辕，独往入幽冥”，以反规荒废万几之失，明不如王道太平之可慕也。孰谓太白不闻道，但赋凌云飘飘之气者？[3]

此笺文明言《春日行》一诗的主旨是讥讽唐玄宗求仙。这就与常人所认知的李白求仙颇显不同了。李白希望君主能励精图治，效法轩辕黄帝，不事求仙这种无益于治道的事，而是致力于“太平之道”。魏源在此段文字中以语气颇强的反问指出李白不只有“赋凌云飘飘之气”，亦有探问治世之道的作品，言下之意，读者当关注李白的多元创作，特别是李白伸显经世之志的一面。

次言李商隐，李商隐以擅长写男女邂逅主题及诗风朦胧、空灵而闻名于诗史。然魏源在《诗比兴笺》中却并未选钞李商隐上述主题及风格的诗作，如李商隐名篇《无题》《锦瑟》等等，却只选了一首《井泥四十韵》，这种选诗方法可谓别出心裁。魏源在《井泥四十韵》后的笺文中指出：

观篇末致慨于秉钧之人，且有虎而翼、凤而鸡之虑，则知为牛、李之党而言之也。扬之升天，抑之入地，所好生毛羽，所恶成疮疣，用舍不平若斯，君子值此，惟有安命而已。前半篇杂陈古今升沉变态，皆为篇末张本。纯乎汉魏乐府之遗，于义山诗中亦为变格[3]。

尽管魏源指出《井泥四十韵》是李商隐“惟有安命”之作，但“惟有安命”系李商隐“卒章显志”方才托出的情感，在诗句当中，李商隐渴望用世的情怀往往而在，如“伊尹佐兴王，不藉汉父资。磻溪老钓叟，坐为周之师”便如是，连用前代名臣伊尹、姜尚辅佐君王成就伟业的事例，借此抒发自己渴望伸显才华的理想。《井泥四十韵》一诗从艺术上说，语调铿锵、慷慨不平，古意迭出，魏源认为李商隐此诗具有汉魏乐府特色，是“义山变格”，与李商隐其余诗作颇为不同。魏源特意将其选入，在艺术上，是为了标举李商隐承袭前代诗作的一面，而在诗歌内在情志上，实为标举李商隐用世情怀的需要。

3. 结语

《诗比兴笺》寄托了魏源在清晚期变局中的情志，综合呈现了他的文学观与时局观。魏源在《诗比兴笺》中选入了一篇并非诗体的作品——陶渊明《闲情赋》，其原因在于《闲情赋》长于比兴且祖《风》《骚》，对诗歌一体有借鉴意义。是为《诗比兴笺》在选、评方法上注重“诗文互渗”的第一个方面。

《诗比兴笺》与魏源另一部文学选本《皇朝经世文编》有着文学思想上的会通，特别是“经世致用”思想在两部选本中均有明显的呈现，是为《诗比兴笺》在选、评方法上注重“诗文互渗”的第二个方面。魏源大力标举魏晋时期隐遁诗人阮籍、陶渊明的发愤志向，把二人视为仁人志士。魏源对唐代大、小李的用世情怀也颇为赞许，以选诗、笺文揭示了李白、李商隐少为人知的精神面貌。《皇朝经世文编》编成时魏源尚值青春，而到《诗比兴笺》编成时，魏源已是晚年，可见魏源终其一生都十分重视“经世致用”。在撰成《诗比兴笺》的二年前（1852），魏源撰成《海国图志》一书[14]，以“睁眼看世界”的姿态历述世界各国形势特别是与海防相关的时局，《海国图志后叙》指出：

夫悉其形势，则知其控驭，必有于《筹海》之篇，小用小效，大用大效，以震叠中国之声灵者焉，斯则夙夜所厚幸也[15]。

显而易见，魏源希图这部明晰天下形势的《海国图志》有益于当世，表达了愿以此著对时人起振聋发聩之效的夙愿。魏源还向其友人陈沆表达了自己未能见用于朝廷，以伸显才干的遗憾，在为陈沆撰写的《简学

斋诗集序》中，魏源指出：“独恨予以君所极期望之人，而蹭蹬半生，流离颠沛，无以报君知人之明。”[6] 魏源认为自己蹭蹬半生，颠沛流离，不能展示济世才华，以实政建立功业，无以回报陈沆的殷切期望，颇为自责。此序作于《诗比兴笺》完成前一年[14]。不论是撰成《海国图志》还是为陈沆撰写《简学斋诗集序》，魏源均届晚年。由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到《海国图志》再到《诗比兴笺》，魏源积极入世、经世致用的情怀始终不渝。由此，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魏源在《诗比兴笺》中选钞阮籍、陶渊明之作时要标举他们发愤为诗的一面，有意隐去他们消极避世的情绪，而在选钞李白、李商隐之作时，也要大力标举他们积极用世的一面了。而“诗文互渗”正是魏源在选本中呈现“经世”之志的一大方法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马玉.《诗比兴笺》考论[D].合肥:安徽大学,2013:19-20.
- [2] 柯柏琴.《诗比兴笺》研究三题[D].南昌:江西师范大学,2017:43-45.
- [3] 魏源.魏源全集:第12册[M].长沙:岳麓书社,2011.
- [4] 方东树.昭昧詹言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61:482.
- [5] 苏轼.东坡题跋[M]//丛书集成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6(卷二):29.
- [6] 魏源.魏源全集:第13册[M].长沙:岳麓书社,2011.
- [7] 陈其泰,刘兰肖.魏源评传[M].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5.
- [8] 贺长龄,辑;魏源,编次.皇朝经世文编[M].上海:广百宋斋,1887(光绪十三年).
- [9] 葛士濬.皇朝经世文续编[M].上海:图书集成局,1896(光绪二十二年):俞樾序1.
- [10] 锺嵘,著;曹旭,集注.诗品集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:260.
- [11] 鲁迅.且介亭杂文二编[M]//鲁迅全集:第6卷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:422.
- [12] 袁行霈.陶渊明的《闲情赋》与辞赋中的爱情闲情主题[J].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92(5):67-74.
- [13] 欧阳修,宋祁.新唐书:卷202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:5672.
- [14] 李瑚.魏源诗文系年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
- [15] 魏源.魏源全集:第4册[M].长沙:岳麓书社,2011:8.